

#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王守中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由教士教民肇事者8起,占18%;官绅民众肇事者36起,占82%。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

**关键词:**教案;天主教;义和团

**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3-0084-05

教案与义和团发生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的论者只强调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忽视甚至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帝国主义侵略无疑是教案与义和团发生的原因之一。正是西方列强用大炮将基督教打入了中国,并且大炮与宗教相表里,不断扩大与加深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从而导致守旧官绅和民众的反教案,并最终演化成了义和团的“灭洋运动”。但是从反教案的多发地和义和团起源地来看,它与遭受外力侵略的程度并不成正比而恰成反比。即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较重的中国沿海地区发生教案相对较少,而遭受侵略相对较轻的内陆地区,反而教案多并最终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例如,从全国来看,在19世纪下半叶,遭受列强侵略最严重的是广东、上海、天津等省市,而教案发生最多的却是遭受外力侵略较轻的四川省。就山东地区而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遭受列强侵略最严重的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而山东教案分布特点,却恰恰是受外力入侵相对较轻的西部地区最多。据1861—1864年山东地区所发生的46起教案的统计,共涉及30个州县和城市,其中发生在济南、泰安、兖州以西及黄河以北地区的共21个州县和城市,占发生教案州县城市总数的70%,东部地区包括鲁南的郯城县在内共9个州县城市,仅占30%<sup>[1]</sup>。这些事实说明,研究教案与义和团的起源,要能自圆其说,不能排除促使其发生的其他因素。

有论者认为,义和团之所以反对新的生产方式,是因为

列强用大炮运来的商品和机器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就以义和团激烈反对的铁路和轮船来说,当时中国的铁路才刚刚开始修建,并没有对国民经济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失业的人究竟有多少,值得研究。据袁旭估计,庚子前后,顺天府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约四万余人”<sup>[2](1947)</sup>,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也为一些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受铁路、开矿之利者又有多少人,就没有人提及了。至于轮船运输业确乎使中国的帆船业大衰,因此失业的船夫、水手为数不少。然此类失业者最多的是沿海地区的人民,他们为什么不去组织义和团反对轮船运输业?至于内地运河运输业的停滞,与近代沿海轮船运输业的兴起固然有一定的关系,然运河运输停滞和废弃的根本原因,一是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造成了清政府漕粮运输的大幅下降;二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从山东穿过运河入海,使大运河山东段淤塞,清政府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年年挑挖,也仅能维持少量运输。至1900年,漕粮大都改成折色,便将运河废弃了。因而运河船夫、水手以及相关的脚夫和各种店铺人员失业者,虽不能说与清政府恢复海运没有关系,但主要原因却是黄河淤塞运道的结果。至于把船夫、水手的失业,说成是因为修筑了铁路的缘故,更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还没有修筑起一条南北运输的大铁路,铁路怎么会成了船夫、水手失业的罪魁呢?

洋货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在1900年以前,受冲击最厉害的是沿海地区,而教案多发地和义和团的起源地,却

\* 收稿日期:2001-08-30

作者简介:王守中(1934—),男,山东寿光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恰恰不在沿海而在内地,亦即受洋货冲击相对较轻的地区。如果说来自西方的机制商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失饭碗最多的也应是沿海地区的人民,可是他们却没有像义和团那样去憎恶洋货。所以,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视为义和团发生的主要因素,至少就山东的情形看,是没有说服力的。

## 二

当时的山东地方官吏中,不论是同情、支持反教者与义和团的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还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其他官吏,都异口同声地说教士、教民对平民的欺凌压迫,是激起民众反教和义和团的根本原因。历史事实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圣言会的传教区内,矛盾比较尖锐。其原因主要是教士急于发展教徒,把一些不良分子拉入教内,在这些人肇事以后,教士往往又滥用特权,袒护有加,引起官绅民众的反感与憎恶,这无疑激起民众反教的重要原因。但就整个教案统计来看,真正由教士教民肇事的案件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895年以前山东发生的46起案件教案中,除民人与教民的一般民事纠纷2起忽略不计外,其余由教士教民肇事者共8起,占案件总数的18.2%,由官绅民众肇事的36起,占81.8%。甲午以后山东64起教案的统计更进一步表明,刀会、拳社组织成了教案的主要肇事者,教士教民肇事案件的比例就更小了。像地方官禀报中所说的教士教民欺凌压迫平民的事,大多都是泛指,此类案件究竟有多少,从没有具体统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此类情况仅限于德国圣言会的教士教民,天主教方济各会和英、美等国新教各会的教士教民,很少发现类似情况。然反教者和义和团却没有因此而不同教会加以区别,这固然有一般民众分不清何国教会有关,但也决不是一概笼统地用教士教民的欺凌压迫所能解释通的。

人们通常认为地方官对教案不能“持平办理”,是激起民众反教的另一重要原因。不论是言官御使还是督抚大臣;不论是地方士绅还是一般民众;不论是教士教民还是外国公使,都无不持此观点,但其含义却各有不同。有的认为是州县官受外人挟制而袒教抑民;有的认为是地方官“不遵约章”而有意阻止传教,对挑起事端的士绅不作处理等等。地方官为何各方面都不讨好而多遭谴责?他们处理教案是否都不持平?关键问题在于以何为“持平”的标准。

州县官办案,向以中国的传统法律和民俗为依据,但是列强的“治外法权”和基督教的习俗,使中国的传统法律和民俗受到了严重挑战,这既使地方官感受到了权力的失落而愤愤不平,也对超出了传统法律和习俗的民教案件难以适应。如对教民不参加迎神赛会引起的民教冲突案件,若按传统法律习俗处理,令教民参加这类公众活动并摊派相应的费用,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习俗,教士教民就认为是不能“持平办理”,必不答应;若允许教民不参加这类活动和摊派此等冗费,又必然招致平民的不满。所以这类教案无论怎样处理,都会遭到不同人们的谴责。按实际情况,当时的一般官吏都是很传统的,他们遇到求神祈雨、风水迷信等民教冲突案件

时,即使不得已按照总理衙门关于永远不得向教民“勒摊勒派”此等冗费的指示办理了,其内心也是不情愿的。特别当遇到旱灾州县官亲自率众祈雨时,教民不参加,不摊派有关费用,那些官老爷们心里什么滋味,是不难想像的。因而,当士绅民众因迎神赛会和保卫圣道等与教士、教民发生冲突,或阻止教士设堂传教时,厌恶教士、教民的地方官大都站在民众一边,一起反对教士设堂传教,由此又招致外国教士和公使的责难。否则,允许教士设堂传教,就是“袒教抑民”了。整个社会处在蒙昧迷信状态,有关民教冲突事件的发生,岂止仅是地方官的责任。

一些御使言官等谴责地方官对教案不能“持平办理”,大都是以传统法律习俗为尺度的,所以他们得出“袒教抑民”的结论;外国教士和公使谴责地方官不能“持平办理”,则是以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宽容条款”为依据的,他们对限制教士购地建教堂和歧视教民的行为,则往往“执约以相诘责”;袁世凯谴责地方官不能“持平办理”,则认为他们不懂约章,对仇教者不但不肯查禁,反而对众风煽,潜导而阴驱之。息教案既成,强邻执约以相诘责,则又畏洋人如虎,任其欺凌勒索,无益于民,图病于国。所以袁强调“调和民教”,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sup>[3](196-99)</sup>。论者一直对袁世凯的政策持批判态度,难道像1899年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那样,一味煽动反教,造成大量“无益于民,图病于国”的教案就正确吗?

## 三

山东教案的多发地和义和团的起源地,所以在鲁西内陆而不在鲁东沿海地区,与帝国主义侵略有一定的关系,然更为重要的,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等发展差异的缘故,同时也与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相关。

山东西部地区,包括曹州府、兖州府、东昌府、济宁直隶州和济南府的部分州县,多属黄泛冲击平原,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古代,易于耕作,因而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摇篮。但与东部的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相比,西部环境比较闭塞,近代以来在外力刺激下,东西部的发展表现出显著差异。山东东部地区雨量比较充沛,旱涝灾害较西部地区为少,是山东小麦、玉米、甘薯的高产区,也是花生、水果和柞蚕的生产基地。此外,沿海各州县海产品也很丰富。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东部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同时,该地区沿海港口众多,商业贸易活跃,人民思想也较开放,比较易于接受外来思想和新鲜事物。而西部地区盐碱土质分布面积大,土壤贫瘠,生产条件差,同时经常遭受黄河泛滥的危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穷困生活的折磨使人心烦意燥,失去忍耐力,易于产生各种纠纷和矛盾,为各种秘密结社的流传创造了适宜的土壤,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民教冲突只不过是诸多社会矛盾中的一种。这些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所以,山东西部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事最多的地区之一。仅在19世纪50至60年代,该地区就爆发过鲁西南的长枪会起事,鲁西北的白莲教和宋景诗起事,以及运河沿岸的幅军起事等等。这些起事少者数万人,多者十

数万人,均转战于山东西部地区。此外,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和捻军,也曾数次转战山东,而主战场也在山东西部。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山东各地农民起事,征调大批军队云集山东,使该地区遭受了残酷的战争浩劫,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民众生活愈加困苦,人民耐性不足而燥性有余,习拳练棒,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匪盗用以打家劫舍,良民用于防身护家。

除了经济条件造成鲁西地区社会矛盾较多外,山东教案的多发地和义和团的发源地之所以在鲁西,与当地人对儒家文化的感情也有关系。山东西部在古代是儒家文化的发达地区。翻开历史,我们看到,古代鲁西人靠攻读儒书在历朝作官的,不仅比山东东部地区多得多,就是在全国也是著名的。这种传统使他们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但儒家文化是以过去为理想的,这便养成鲁西人特有的保守性格,比之其他地区为甚。虽然后来鲁西地区的经济落后了,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降低了,作官的人大大减少了,但士绅们对儒家文化的感情和卫道意识,却没有因此而减弱。特别是孔孟故乡的兖州府和济宁直隶州所属各州县的人民,对儒家文化更是心向往之。而基督教的教义则与儒家的纲常礼教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传教士们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和冲击,使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渐渐产生了信仰危机。为保卫儒家文化传统,对儒家文化有特殊感情的鲁西人,在强烈的卫道意识驱使下,必然向基督教挑战者发起猛烈抗击,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反应。

正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养成山东东西部人民不同的民性。山东东部本来也是“地瘠民穷”,但由于地处沿海,交通便利,人民与外界交往较多,比较重视发展商品经济。有关志书记其民俗说:莱州府“男通鱼盐之利,女有纺绩之业”;潍县“民务农商,有富庶之风”;博山之民“本业不足,治末有余”<sup>[4](P6)</sup>等等,都表示东部人民“贱商”思想较轻。近代以来虽受外力入侵较重,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由于人民心态比较开放,他们没有千方百计地去维护男耕女织的旧体制,而是转向了从中外贸易中寻找实惠。他们很快地接受了传教士等人引入的草帽辫、花边等手工艺,并使其产品成为山东省重要出口商品。对于传教士引入的美国大花生和新的果树品种,人们也迅速传播种植。同时,随着蚕丝和茧绸出口的增加,民间养蚕业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人们从中外贸易中得到了实惠,也使他们有了一点余钱去购买外国机制商品。这样一来,人们对洋人洋货习以为常,也就不会盲目地去排斥了。山东西部比较偏僻,人民深闭固拒,不习外务。有关志书记载其民俗说:菏泽县“男子专务耕织,不事商贾”;巨野县“民务耕织,不好远游”;单县民“以耕桑为业,不通商贾”<sup>[4](P23)</sup>;冠县“人多愚直,易于鼓惑自胜,自清末以迄于今日,白莲教、青红帮、黄沙会、圣人道及各种神教名称不一,皆假借神道以聚徒结社,善男信女趋之若鹜”<sup>[5]</sup>。这和东部人民“务农商”、“治末有余”的风气是何等的悬殊!环境闭塞,重农轻商,安土重迁,导致了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民心态保守,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只能在传统小生产的模式

里转圈子,在神道结社中寻求慰藉,因而极易受蛊惑并产生排外思想。所以,当1900年东部人民继续同洋人做生意,将草帽辫、落花生、茧绸和丝等土货扩大出口时,西部武城县的义和团却以洋货为名,将沿运河贩运草帽辫和落花生的“全船货物烧抢一空”<sup>[6](P39)</sup>。

有论者认为,鲁西地区各种异端活动盛行和成为义和团的故乡与该地区士绅稀少和软弱有关<sup>[7](P66)</sup>。笔者认为,关键不是士绅的多少和强弱,重要的是士绅的文化心态。

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而儒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作为圣人之乡的山东士民,历来尊儒学儒,对传统文化富有优越感。当基督教对官绅权力、家族制度、儒学理念、传统信仰产生巨大冲击,特别是与儒家纲常伦理发生尖锐矛盾时,那些以饱读诗书自诩的士绅们,更以卫道士的身分出现,或台前或幕后地倡导各种形式的反教活动,或者阻挠教士置买房产,或者不准教士设堂传教,甚至驱赶教士、打击教民等等。因而山东各地均有士绅倡导反教案件的发生。但相比之下,山东西部的士绅比之东部的士绅心态更加保守,卫道精神也更为强烈。对此有关志书多有记述。如记滋阳县“士风和厚雍容,不事奔竞”。泗水县“周孔之教,衣被独多,士廉而朴,不习进取。民贫而惰,不善盖藏”。聊城县“近邹鲁之乡,沾孔孟之化”,民“务稼穡治生,不喜为吏”。茌平县“地近圣居,重礼教而尚名节。人多淳厚,好文学而务农桑”。济宁州“土俗久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则鄙野难治”<sup>[4](P11)</sup>等等。这种传统心理习俗,是阻碍人们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无形之墙。同样是山东士民,居东部者就很少有“近邹鲁之乡”、“地近圣居”而自高的感觉。相反,他们受沿海环境的影响,心态比较豁达开放,有的士绅甚至转而从事与中外贸易有关的新式商业,促使东部逐渐向现代化发展。台湾学者张玉法教授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因克斯关于现代化的九种心理倾向的理论,曾对近代山东人民与现代化相关之心理状态作过测度,现摘录东部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和西部兖州、曹州、东昌三府的测度结果如下:东三府各属传统心理指标得29项,现代化心理指标18项,传统心理与现代化心理之比为1.61:1。西三府各属传统心理指标得53项,现代化心理指标得12项,传统心理与现代化心理之比为4.42:1<sup>[8](P38)</sup>。由此可见,西三府人民的保守性要严重得多。这正是西部人民不善于容纳新事物,惮于变革,反对异质文化的基督教,维护旧传统的根本原因。所以,西部教案多于东部,并最终成为义和团的故乡,也就不不足为怪了。

山东西部之所以成为教案多发地和义和团的故乡,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山东西部是天主教势力的集中之地。意大利方济各会的势力集中在济南、东昌、泰安、武定4府和临清直隶州等地;德国圣言会势力集中在兖州、曹州、沂州三府和济宁直隶州等地。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教义和礼仪等方面,天主教保留了较多中世纪的烙印,而在反封建斗争中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新教,则反映了资本主义节约、平等、民主的精神。这就使该两教近代来华的教士在思想作

风和传教方针等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其一,天主教神职人员实行教阶制,不同职位的人员具有不同的权利。这就滋生了他们在中国要求官阶的思想。他们要求按照教中品秩对等中国官吏品秩,使其神职人员在中国享有相应的礼仪,并于1896年迫使清政府制定了《接待事宜五条》,从法律上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此外,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还从清政府接连索得了三品、二品、一品顶戴的头衔。而新教教士在这方面则未曾有过分要求。相比之下,自然引起官员们对两教的不同反应。其二,天主教,尤其是德国圣言会的教士,作风粗暴,行为专横,也引起中国官绅民众的强烈不满。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就是个生硬鲁莽之人。他不仅遭到中国官绅民众的猛烈抨击,就是在德国教士中间,也不是很受欢迎的。他经常对官员们横加指责。主教这样,其手下的传教士有的则更变本加厉。1895年,署兰山县令朱钟琪就曾控告圣言会教士白明德说:“卑县德国教士白明德者,阴险谲戾,贪诈凶横,一味恃势凌人,不识礼义廉耻。所收教民类皆市井无赖齐民不齿之徒,每每恃教欺压乡民,一有齟齬,白明德就颠倒曲直,代为出头函请究办,并不遵约令教民自行具呈。遇有伤痕,亦不令其到案请验,无凭无证,不准不休。每案必捏称打伤教友,为抵制之谋;被抢财物,为讹诈之计;甚至讹财物又讹地,俾可广立教堂。其计愈狡,其势愈横。不特在本县如是,闻郟城、费县等处,皆控案累累,莫不痛心疾首,敢怒不敢言。”而对同在该县传教的美国新教教士纪力实,朱钟琪则印象甚好,称“其人颇知礼仪,安分少事,决不与民争竞,干预公事。百姓也礼貌有加。”因此,该县令请求巡抚李秉衡转咨总理衙门,转告德使,将白明德黜之归国,或调至远方;对美国教士纪力实加以表扬,以资观感<sup>[9](P69)</sup>。从这一例证可见,天主教士与新教教士思想作风之不同。其三,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方针也有很大差异。天主教大都着眼于以发展教徒为目的,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为发展教徒,教士们尽力为其提供政治上的帮助。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就曾在他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写道:“为了确保传教士工作的顺利进行,传教士有时必须帮助教徒打官司。有时不老实的信徒会滥用教士的善心而胡作非为,有时传教士成为教徒虚假虔诚的牺牲品。”<sup>[7](P90)</sup>尽管这样,然教士帮助教徒打官司的事仍屡见不鲜。因为这种政治援助在易于发生纠纷的鲁西地区,是吸引教徒的最为有力的手段。所以,虽然天主教投入的人力物力远比新教少,但他们发展的教徒却比新教多得多。例如,到19世纪末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和圣言会在山东共派有56名教士,发展教徒8万人;而新教15个差会数以百计的教士,总共才发展教徒13364人<sup>[10](P22)</sup>。由于天主教发展教徒不择手段,故其教徒素质太差。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穷苦的民众,但难免混进一些惹是生非的不良分子,极易滋生教案,因而针对天主教的教案远比新教多。如1861年至1894年山东发生的46起教案中,属天主教的36起,占78.3%;属新教的9起,占19.6%。

#### 四

有论者常常把反教者和义和团作为“觉醒”的力量加以

标榜,对其评价甚至超过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革力量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这未免有点不实事求是。什么叫“觉醒”?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觉醒,就是醒悟;觉悟。是指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程度,即“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如果是觉醒的力量,在当时就应当达到如下两点认识:第一,就中国的国情来说,应认识到中国已经落后了,需要改革或革命;对旧传统哪些应当扬弃?哪些应当继承?怎样才能把中国推向前进?第二,就反对帝国主义来说,什么叫反帝?什么叫排外?怎样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达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恰恰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反教者和义和团是不能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革力量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相提并论的。当时的改革力量和革命力量,都一致认识到中国已经落后了,因而他们均以世界先进国家为参照系,对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制度进行了批判,倡导新思想、新道德和建立新制度,通过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把中国推向前进。当时他们虽然都没有直接把矛头对准外国侵略者,但他们都痛恨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其奋斗目标,最终都是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当时推动中国前进的觉醒力量。而反教者和义和团,在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上,却没有一点是“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的。他们根本不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了,因此无须改革或革命,而提出“扶清”的口号,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结合起来,在盲目排外的同时,也反对改革和革命。所以,在反教者和义和团的救国方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一条主张改革、建设国家的材料。他们奋力保卫的,都是中国已经落后了的旧的传统和制度,并把那些最无价值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愚昧迷信发展到了极至。绝大多数教案和义和团的研究者都认为,反教者和义和团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他们分不清什么叫反帝,什么叫排外,因而陷入盲目排外的境地。反教者与义和团的主要目标是想灭掉洋教,把一切洋人洋物清除出中国。其斗争的主要手段,是用烧杀抢掠来“灭”中国的教民。这种简单化的粗暴手段,不可能解决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因而也就灭不了教。他们幻想凭借“神灵保佑”和“刀枪不入”的迷信武器,把一切洋人洋物都赶出中国,在中国那样贫弱的时代,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反而使中国负了一个违背国际公法之名,遭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灾难。即使退一万步说,假如义和团能够成功,把一切洋人洋物都清除出去,把中国再拉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拒绝与一切外人交往,拒绝接受外洋的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把自己孤立于地球之外,只能对中国有害,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产生于保守土壤上的义和团,其盲目排外的行为表明,它不是一支推动中国进步的觉醒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旧制度犯的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历史的谬误。反教者与义和团演出的就是反对新制度,维护旧传统、旧制度的历史悲剧。(下转第95页)

- [14] 魏收. 魏书·高允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 马大正等. 中国边疆经略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 [15]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8] 司马迁. 史记·赵世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6] 宋濂等. 元史·世祖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9] 利玛窦等.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and Sinocentrism

Li Yunq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Sinocentrism mad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become the main sense of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two.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clash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between them was expressed in two extremely conservative forms—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beasts as between the two, the view that the two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the distance to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between the two and sinocentrism had both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time passing, their negative effect became clearer.

**Key word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beasts; sinocentrism

责任编辑: 时晓红

(上接第 87 页)

### 参考文献:

- [1] 王守中.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 [2]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义和团(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7.
- [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9.
- [4]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 上编[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5] 侯光陆. 冠县志: 风俗[Z]. 民国二十三年.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室. 山东义和团案卷[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7] 周锡瑞.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8] 张玉法.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M]. 台北: 民国七十年刊.
- [9] 教务教案档: 第 5 辑[M]. 台北影印本.
- [10] 陶飞亚, 刘天路. 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

## Shandong Religious Cases and the Yihetuan Movement

Wang Shouz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r 19th century, most Shandong Religious Cases didn't occur in East Shandong but West Shandong. Among these cases, the clergymen and believers caused 8 cases and 18% of the total ones. The officials, gentlemen and the populace caused 36 cases and 82% of the total ones. Most cases harrened from 1894 to 1901 were caused by the Broadsword Societies on Boxing Organizations and finally made West Shandong to become the birthplace of the yihetuan Movement. It shows that these phenomena couldn't be explained only by simple repeating some traditional viewpoints. It bears some relations with the imperialist aggression. But the more important causes are: 1.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Shandong and West Shandong. 2. different ideological styles and missionary policies of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Key words:** religious cases; Catholicism; the yihetuan Movement

责任编辑: 时晓红

#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作者: [王守中](#)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山东, 济南, 250014](#)

刊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2, 47(3)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0条)

1. [王守中](#)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 2000
2.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义和团\(一\)](#) 1967
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义和团档案史料](#) 1969
4.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 上编](#) 1988
5. [侯光陆](#) [冠县志: 风俗](#) 193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室](#) [山东义和团案卷](#) 1980
7. [周锡瑞](#)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1995
8. [张玉法](#)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9. [教务教案档](#)
10. [陶飞亚](#), [刘天路](#) [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 1994

##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刘青瑜](#), [LIU Qing-Yu](#) [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 -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8(1)  
 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活动是嘉庆朝禁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嘉庆朝最大的教案, 在天主教东传史和清代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此次禁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中外文化冲突、天主教与当时的民间秘密教门的相似性和传教士之间的争斗.

2. 学位论文 [程玲娟](#) [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东教案研究](#) 2006

晚清山东教案或民教冲突主要是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山东地方社会发生一系列碰撞而引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频繁发生碰撞, 这种碰撞的根源与实质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教会教士在入住并试图立足于山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 与地方社会所发生的碰撞主要缘于教会教士作为一种新的不同的势力强行涉入地方社会所引发的社会空间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 本文即是从资源争夺的角度来审视晚清山东所发生的重要教案或民教冲突. 一般来说, 资源争夺可分为物质资源的争夺和非物质资源的争夺. 本文选取梨园屯教案、兖州教案等作为非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 在这些教案中, 民教双方的冲突主要围绕非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 本文选取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诸如曹单场山教案、巨野教案、沂州教案、嘉祥教案等作为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案来探讨, 在这些教案中, 民教双方的激烈冲突主要是由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引发并展开的.

梨园屯教案发端于传教士和教民要在该村玉皇庙建立教堂, 此案中民教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发展与农村民众玉皇信仰息息相关. 所以该案可以被看作是“上帝”与“玉皇”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 玉皇庙已经成为村社中公共的文化信仰空间, 而教堂作为陌生的异质空间, 在外国公使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被迫授权下, 强行切入村社抢占村社公共的信仰空间; 与此同时, 教会势力与村社精英展开政治资源的争夺, 当村社精英不得不成为村社事务的旁观者和容忍者时, 教会便成功夺得原本属于村社精英主导的管理空间和权力空间. 为了维护传统村社的空间资源及空间秩序, 村社精英特别是村社布衣精英与民间组织结盟, 领导民众将这一对抗进行到底. 如此, 教会与村落、村落群的空间争夺战在持续升级中通向义和拳运动的爆发.

兖州教案缘于天主教教言会主教安治泰欲进入儒教圣地——兖州城设堂传教, 因此该案可以被视为“上帝”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冲突. 作为圣人故里兖州早已历史地成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空间、儒教信仰空间, 而兖州官绅则是这一方文化空间、信仰空间的天然尊长和当仁不让的主宰者, 他们掌控着这一空间内的诸多资源如文化资源、信仰资源及舆论资源等, 而这些资源又现实地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源. 教堂作为陌生空间, 依恃强权屡次试图打入异教空间的圣域, 兖州官绅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各种资源, 于教案初期发起强有声势的“揭帖”战, 并以“身体”和“性”为主题与教会方面展开信徒资源的争夺. 最后在德帝国强权的支持下, 教堂空间终于成功切入兖州城. 教会空间的成功切入从“符号战争”的角度来说, 天主教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反教斗争以及官绅所掀起的反教舆论动员已经使得反教的观念、意识在更大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 空间的争夺势头和深入人心的反教动员相结合, 在随后的义和团风暴中深刻显现出来.

从如上的教案来看, 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是造成民教矛盾与冲突长期胶着的主导因素, 但是把晚清山东教案之主要原因都归结为非物质资源的争夺, 显然是片面的, 它更广泛的是表现为物质资源的争夺. 或者说物质资源的争夺在某些地区的教案诸如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中表现的更为激烈、残酷, 如曹单教案、巨野教案、嘉祥教案与沂州教案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交织着权力的争夺. 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为教会依恃强权广泛干涉地方词讼以及争夺村社主导权等; 而物质资源的争夺则主要表现为财物、收获物、房产及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 在生态危机中, 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欲立足于地方社会并得到扩展, 就必须参与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 在这场资源争夺运动中教会因有国际背景而占有优势, 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才能够以强劲的气势冲击、挤压着地方社会的经济空间、权力空间以及民间组织空间. 势必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地方官绅及民间组织的或明或暗、或缓或急、或单独或联合的抵抗与斗争. 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的步步进逼之下, 国家的生存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 大量的民教冲突在长期的、严重的资源争夺中不断趋向激化、升级并最终通向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3. 学位论文 [张云峰](#) [贵阳教案再研究](#) 2009

贵阳教案是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影响较大的教案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 贵阳教案是西方侵略中国的产物, 而中方是反侵略的行为; 教案的交涉和处理过程中, 法国依仗强大的国家实力提出无理的要求, 清政府继续沿着妥协投降的路线, 出卖民族利益. 仔细查阅相关史料, 结合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情况和贵州当时的形势以及清政府围绕贵阳教案的交涉, 不难得出与传统观点相异的结论: 贵阳教案是贵州官绅不满天主教传播对自身政治、文化权威的冲击, 同时为转移贵州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引发的尖锐的内部矛盾而盲目排外所致; 教案交涉过程中, 清政府审时度势, 通过适当的妥协, 最终妥善解决了贵阳教案, 避免了战争. 法国传教士在进入贵州传教的同时, 在当地兴办新式学校和慈善事业, 对拥有文化资源和权利资源的当地官绅的权威

是一大挑战。咸同时期的贵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全省烽烟四起,农民起义不断,地方当局无力镇压,为了转移视线,便把矛头对准在黔天主教教徒和传教士,发动盲目的排外运动,制造了贵阳教案。教案爆发后,法国依据中法之间既定条约,要求惩办凶手,赔偿白银。清政府对贵州官绅“草菅人命”和“害及外国传教之士”者也准备“设法惩办”,但又认为教案的处理“关涉国体,若徇外国人之情,将中国带兵大员即行惩办,转足以涨其骄”,因此对教案的交涉一度采取推诿延宕态度。在既定条约的约束和国势衰微情况下,清政府艰难的从传统的羁縻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应允惩办贵州地方官员,赔偿白银和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以明智的妥协了结了贵阳教案,避免了战争,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 4. 期刊论文 [汤开建,刘清华. TANG Kai-jian, LIU Qing-hua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5\(5\)](#)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案,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 5. 学位论文 [史伟东 雍乾嘉查禁天主教案的法制考察 2006](#)

本文对雍乾嘉查禁天主教教案进行了法制考察。文章认为,雍乾嘉查禁天主教具有四个特点:一、总的趋势是查禁越来越严厉,法律条文越来越明确和严密;二、雍乾嘉查禁天主教受皇帝个人影响很大;三、禁教的严厉程度与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四、雍乾嘉查禁天主教的另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和国际因素相关联。这四个特点中第一点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查禁天主教的法制日趋完善,反映了清王朝的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 6. 期刊论文 [田胜,黄升永 1869-1870年建德教案研究 -安徽文学 \(下半月\) 2009, "" \(7\)](#)

建德教案是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结果是清政府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打压非教民。这场教案也对当地特别是当地官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纵观建德教案发生的原因、经过,应给建德教案一个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 7. 期刊论文 [刘国强 清末广东教案透析 -安徽文学 \(文教研究\) 2007, "" \(4\)](#)

清末广东,是教案的多发地区之一,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在耙梳、整理、分类统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末广东教案发生的原因、性质、影响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便更加深入地探讨教案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8. 学位论文 [刘国强 清末广东教案研究 2003](#)

该文所关注的问题有三:第一,清末基督教在广东传播情况怎样,教案与基督教传播、教案与不平等条约关系如何?第二,清末广东教案的总体状况怎样?换句话说,清末广东一共发生了多少起教案,其主要原因、特点如何?第三,清末广东教案的性质和影响怎样?该文从原始资料入手,耙梳清末广东教案的来龙去脉,进而根据清末广东教案的特点,划分七个时期,逐期讨论分析;同时对影响较大并具有显著特点的一些教案进行了个案研究,以便更清楚的认识清末广东教案之复杂情况。通过对清末广东教案的全盘考察,首先可以认知,其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教案起因比较单纯,但多数教案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这些原因包括:对列强侵略的痛恨和反抗;中西之间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晚清广东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治安状况恶化等。其次,从总体性质而言,清末广东教案具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但也具有盲目性和落后性。再次,从总体影响而言,清末广东教案给帝国主义传教势力以一定的打击,迫使它有所收敛和在侵略手法方法有所改变;但是教案的落后性、盲目性,使它并没有达到阻教会势力的扩张和反侵略的目的,相反,每次教案大都以教会获取到更大利益告终。同时清末广东教案也加剧了社会动荡,教案的赔款又摊派到百姓的身上,致使百姓生活困顿,民不聊生。总之,清末广东教案无论对西方国家还是对中国都是一场灾难。

#### 9. 期刊论文 [江斐 梨园屯教案与冠县乡村社会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15\(1\)](#)

19世纪中后期,外国教会势力渗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引发了村民之间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观念冲突。同治八年(1869年),梨园屯民教双方议分学之地,教民获得包括玉皇阁庙基在内的三亩多宅第,在如何处理村庄公共财产——玉皇阁庙基这一问题上,民教双方围绕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的五次冲突,折射出了民教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财产权观念上的分歧。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由于地方政府无法协调村内部的矛盾,长达20多年的民教矛盾终于发展成为亲戚乡邻间的血与火的战斗。

#### 10. 学位论文 [李春博 南京教案与明末儒佛耶之争——历史与文献 2004](#)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崔发起的反对天主教运动,被称为“南京教案”。利玛窦的“补儒易佛”传教策略引起儒佛耶之间的早期争论,但他通过学术交流的传教方式把争端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龙华民主持中国教务后,鼓励王丰肃在南京扩大传教规模,儒佛耶之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南京教案爆发。南京教案发生后,教徒被捕,教堂被封,传教士在经过审讯之后被遣送澳门。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儒佛人士对天主教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批判,明末儒佛耶之争进一步深化。普通民众、反教士绅、护教人士、万历皇帝对南京教案的不同反应,显示出儒佛耶之争贯穿于南京教案的始终,南京教案是儒佛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天主教的结果。有关南京教案的史料主要保存在《圣朝破邪集》中,该文最后部分通过对该书的作者、版本与内容的考察,指出它在南京教案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dsdxbrwshkxb20020302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dsdxbrwshkxb20020302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a247bbcd-eeeb-4c66-bcc6-9e4d008231f0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